

以色列安全需求的关键在于可防御的边界： 稳定和平的基础



从约旦河西岸观察到的特拉维夫市中心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以色列安全需求的关键 在于可防御的边界： 稳定和平的基础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המרכז הירושלמי לענייני ציבור ומדינה (ע"ר)

目录

序言：	
面对急剧变化的中东局势，以色列仍需维持充分的可防御边界	3
多尔·戈尔德博士	
确保以色列未来发展的防卫边界	10
乌兹·达杨少将	
捍卫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合法权利	17
多尔·戈尔德博士	
附录	
以色列主要历史事件的主导者	27
About the authors	34
About the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35

序言： 面对急剧变化的中东 局势，以色列仍需维 持充分的可防御边界

多尔·戈尔德博士

以色列前驻联合国
大使、现任耶
路撒冷公共事务
中心主席

当前，以色列正在步入一个异常复杂的战略时期，今后数年它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不但过去依赖的为数不多的战略确定性已不再可靠，还将面临急剧变化的中东局势：以色列周边的阿拉伯政权在风起云涌的人民反抗运动中或是业已被颠覆，或是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支撑。除此之外，其它一些因素也令周边国家的威胁变得更加难以估计。例如，在以色列东面，伊拉克未来的走向仍是未知之数，目前尚无法排除伊拉克最终落入伊朗掌握并对以色列采取敌对态度的可能性。毕竟，在过去数十年中，伊拉克政权对以色列的态度都称不上友好。

就在上述种种不利因素发酵之际，以色列在外交上也在面临新一轮的政治攻击。如果这些攻击生效，以色列将自1967年“六日战争”以来首次失去40年来赖以维系国家安全的约旦河西岸防御。对于东部边防重镇约旦河谷而言，情况尤其危急。一旦以色列同意从约旦河西岸撤军并恢复1967年以前的边境状态，该地区就将永远失去。以色列国防理念的主要构建者：伊加尔·阿隆、莫夏·达扬和伊扎克·拉宾都将约旦河谷视为事关以色列国防生命的重要战略地区。事实上，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在1995年遇刺前就曾宣称：

“守卫以色列最重要的安全边界就是约旦河谷。可以说，其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如果将边境线完全恢复到1967年以前状态的计划得到彻底实施，以色列的国土宽度将仅有8—9英里。考虑到今后数年可能在以色列东方出现的一系列巨大军事挑战，这样的国土纵深将使以色列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由加沙单方面撤军的行动让以色列了解到，一旦它失去了对某一狭窄国土外围区域的控制（比如加沙行动中的费城走廊），导弹和其它最终将用于攻击以色列的各类武器就会如

潮水般迅速涌入该地区。目前，恐怖分子已经沿西奈—加沙边界建立起了数百个走私通道。约旦河谷对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作用正如费城走廊之于加沙。

更加不应忘记的是，以色列众多主要城市均紧邻约旦河西岸地区。

对以色列新一轮的领土要求，虽然无论何时提出均会造成困扰，但目前可谓是提出在了最糟糕的时机。在中东大部分地区反抗活动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更加激进的新势力层出不穷，以色列势力如在此时退出，只会令该趋势愈演愈烈。

诚然，由于区域内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动荡，多个威胁以色列的传统军事势力均被削弱，以色列的外部压力得以减轻。

然而，新的伊斯兰反叛势力网络也随之在以色列边境地区兴起，其中的许多组织已经具备了正规部队的一些属性。

此外，它们还拥有以色列传统敌人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它们置身于人口稠密地区，以平民作为掩护；并将大部分军事设施和装备转移到了地下；一些组织甚至将指挥中心转移到了远离冲突区域的地区。当以色列面对的对手大部分是世俗国家时，它的军事威慑力量可以起到很好的吓阻效果；但当它面对的敌人变为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时，威慑力量还能起到多大作用不免令人存疑。

因此，以色列的当务之急是确保自身拥有足够的能力以物理方式阻止敌人接近或进入该国核心区域。

伴随战略形势的持续变化，对以色列新一轮的外交攻势也正在展开。尤其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巴勒斯坦正在寻求依照1967年边界建立国家。

不仅如此，包括英法德在内的一些欧盟国家也在敦促中东和平四方会谈（由美国、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秘书处代表组成）各方采取类似立场。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于2011年3月在伦敦查塔姆大厦讲话时重申了上述立场。¹ 在华盛顿的公开和私下场合，均有人向奥巴马总统施压，要求他支持欧洲国家的建议，并以同样的领土基线为基础制订以色列未来的国家边界蓝图。²

奥巴马总统2011年5月19日在国务院的讲话令许多以色列人感到震惊，他表示：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边界应当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并在双方协商一致后进行领土互换，从而划定安全、并且双方均能认可的国界线。” 尽管三天后，他又解释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谈判产生的边界线“应同1967年6月4日的实际分界线有所区别”，但对1967年边界线的明确引述，仍让以色列人感到美国的立场同过去相比似乎产生了一些变化。

实际上，传统的美国政策认可以色列无需放弃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作为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后续和平协议的基础，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对这一点有着明确的表述。该决议的主要作者：英国1967年驻联合国大使卡拉登勋爵也对这一宗旨进行了强调。他在接受美国PBS电视台采访时曾表示：“我们没有说，以色列应当退回1967年边界……众所周知，1967年边界并不是一条永久性的国界线。”³ 此后，从亨利·基辛格到沃伦·克利斯托夫的历任美国国务卿均曾在信中就242号决议这一关键因素向以色列作出保证。1988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再次重申：“以色列永远不会以1967年分割线或边界线为基础进行谈判，也不会回到这些边界中去。”⁴

2004年4月14日，美国总统在致沙龙总理的总统信中明确提到，以色列有权拥有充分的“可防御边界”，并应具备独力保卫国家的能力。这一观点从侧面认可了以色列独立自主国防理念的正确性，即，以色列国防军应具备独力捍卫以色列的能力，而不依赖任何外国军队（甚至是北约军队）的帮助。2个月，该份总统信的内容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大部分议员的广泛认同。尤为重要的是，这份总统信排除了任何要求以色列由约旦河西岸撤军并退回1967年边界的可能性。事实上，1967年边界也并非国际认可的国境线，而只是1949年订立的一条停火线。

2011年5月24日，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总理在美国国会讲话时重申，以色列不会退回1967年边界：“以色列不会退回1967年的边界线，因为它是不可防御的。”他指出以色列需要在分界线外维持存在，以满足本国的国防需求，并且尤其强调了约旦河谷的重要性：“以色列必须在约旦河谷地区保持长期的军事存在，这对我们至关重要。”此外，他还提出了“对以色列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

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要点”名单，并称这些地区对于维护以色列和平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讲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总理立即在美国福克斯新闻台接受了西恩·汉尼迪的采访，并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他解释说，在1967年，以色列的国土宽度仅为9英里，这样的国土纵深是不可防御的。他补充说，“美国和以色列签署的协议认可以色列必须拥有充分的可防御边界 [强调]。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地区教会了我们一个简单的真理：无法守卫的和平难以持久。”

不可否认，中东地区风起云涌的反抗活动进一步加深了以色列方面需要保持充分的可防御边界从而保证以色列未来国家安全的观点。

中东地区全新的战略现实

多年来，以色列的战略决策都建立在几项特定的战略基础之上。在每次作出领土让步之前，以色列都会在深刻理解周边国家奉行政策的基础之上，评估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了正式的和平协议。此后，尽管埃及始终拒绝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它仍坚持履行了和平协议的军事条款，维持了西奈半岛大部分地区的非军事化状态。

另一方面，尽管叙利亚加入了由伊朗领导的激进反以军事同盟，并通过支持包括真主党和哈马斯在内的恐怖组织对以色列进行代理人战争，但自1973年以来，它从未在戈兰高地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约旦于1994年与以色列签署协议，正式实现和平。此后，它成功地阻止了恐怖组织和居心叵测的邻国将其拖入对抗以色列的最前线。

今天，从也门到叙利亚、从埃及到巴林，对抗中央政府的反抗活动已经席卷整个中东，这些战略基础也已因此不再稳固。虽然从长期角度看，这一轮变革的浪潮将有利于建立负责任的民主政府，从而降低阿拉伯国家进行军事冒险的风险，但从短期和中期来看，反抗活动的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更加激进的势力将有可能因此获得权力，并试图引发新一轮的冲突。

实际上，以色列并非对局势发展感到忧心忡忡的唯一国家。早在2011年3月22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就曾经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承认：“我认为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因为反抗活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能有好的结果……我们正处于一个困难的时期，没有人知道事件将如何发展。”⁵

这一切都意味着，以色列一方面在思考中东未来走向时不得不面对完全的战略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会被要求做出史无前例的让步而将自身安全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于是，这中间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第一，如果以色列连与其谈判的政府在未来能否继续执政都无法确定，又怎能期待它签署协议，从诸如约旦河西岸这样具备重大战略影响力的地区撤军呢？即便以色列作出了领土让步，也无人能够保证这些代价巨大的和平协议不会在未来被撕毁。更重要的是，目前还完全无法确定，叙利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执政政权是否会在未来被颠覆。

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马哈茂德·阿巴斯的政党之所以能够继续执政，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以色列国防军在整个区域内的部署，以及他们在打击哈马斯及其盟友恐怖活动方面的不懈努力。虽然阿巴斯政权于2011年5月4日同哈马斯达成了新的和解协议，但这并不能消除哈马斯完全统治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风险。正如哈马斯在2007年政变后，也经历了一段与法塔赫合作的时期一样。

从目前的情况看，一旦以色列真的撤出约旦河西岸地区，那么无论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政权出现怎样的变化，以色列都无法指望阿巴斯能够继续维持统治地位。简而言之，在目前的政治局势下，以色列面临的战略不确定性正在急剧增加。

伊斯兰极端分子影响力上升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当前在阿拉伯世界，渴望获得权力并取代现有政府的最强大政治势力均与穆斯林兄弟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2006年以来，中东地区从属于穆兄会网络的各个政党开始定期在土耳其举行会议。同时，他们还获得了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支持。2005年12月，时任穆兄会最高导师的迈赫迪·阿可夫接受了总部位于伦敦的《中东日报》的采访。他在采访中披露，穆兄会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设立了执行机构，显露出该组织在全球扩张的野心。在阿拉伯世界之外，穆兄会在中亚、欧洲西部甚至美国都很活跃。此外，它还同一系列伊斯兰极端组织结为了盟友。比如，它在埃及的崛起，就是因为获得了兄弟政党萨拉菲斯特党的大力支持（该党奉行更加严格的伊斯兰宗教政策）。

从历史角度看，正是穆兄会为包括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和奥萨马·本·拉登在内的全球恐怖组织头目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在过去数年中，随着埃及的穆罕默德·巴迪和约旦的哈曼姆·萨伊德等领导人的崛起，穆兄会的领导阶层正在日趋极端化，秉持更加强硬的对西方路线，并继续主张进行圣战。⁶埃及和约旦的穆兄会分支，如哈马斯，都曾因美国猎杀本·拉登而对其展开抨击。⁷

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的新避难所正在形成

积极致力于同以色列展开武装冲突的恐怖组织可以从伊斯兰政权获得很多帮助，最低限度，也可期望获得庇护。在哈桑·图拉比的领导下，全球第一个穆兄会政权苏丹就曾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帮助哈马斯和基地组织举办训练营。

而哈马斯（穆兄会的巴勒斯坦分支）在2007年以武力夺取加沙地区后，也允许基地分支机构，如伊斯兰军，在境内活动。不仅如此，埃及的伊斯兰圣战者也以相同的方式在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区得到了庇护。

第二，在多个阿拉伯国家，目前的反政府浪潮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大片国土区域的控制，并在很多地区形成了权力真空。希望躲避亲西方阿拉伯军队攻击的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纷纷趁虚而入，试图在这片法律难以管辖的区域内建立新的避难所。

这样的趋势在也门业已显而易见。

在利比亚，的黎波里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东部普兰尼加地区的控制，

尤其是在班加西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民兵组织正在不断壮大。同样的分裂情况也出现在了埃及，尤其是西奈半岛上的贝多因人正在同哈马斯、甚至基地分支机构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他们不但多次破坏向约旦和以色列输油的埃及石油管道，还曾向途经苏伊士运河的船只开火，并最终在一次袭击中杀死了埃及的保安人员。

第三，整个中东地区恐怖组织间的合作正在日趋紧密。早在2005—06年，这一趋势就已初现端倪。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伊拉克的基地组织成员就曾试图在约旦城市伊尔比德建立前进基地。与此同时，杰哈德圣战组织的志愿军成员则在整个中东地区横行。近期，伊拉克基地组织还利用叙利亚内战的机会，建立了叙利亚“救国战线”组织。该组织业已成为反抗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主要杰哈德力量之一。在西奈半岛，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和也门的杰哈德组织成员正在为基地组织建立起不断扩大的组织网络。

最后，中东地区杰哈德组织之间的合作还包括了武器和其它军事物资的大范围运输。

例如，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的军火很快出现在了该国西方的马里和东方的加沙地区。

叙利亚圣战组织杰哈德的军事力量在获得了包括Kornet和Concourse反坦克导弹在内的先进武器后，已经击败了政府军的装甲部队。叙利亚叛乱分子则利用肩扛式对空导弹有效地抵御了政府军战斗机的攻击。

不同于过去，伊斯兰叛乱分子们正在越来越多地装备最先进的军事武器，这将对以色列构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军事挑战。

2006年，黎巴嫩真主党就曾发射一枚先进的岸基反舰导弹，并成功击中了一艘以色列海军舰艇。

因此，在中东正在形成的全新战略环境中，相对遥远的地区一旦发生圣战运动，也可能向邻国甚至相对接近以色列边境的区域输送足以改变战略局势的大量武器装备。

第四，伊朗不断在中东地区谋求巩固霸权地位的行动正在损害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稳定。不但伊朗的军队已经进入叙利亚，德黑兰还在试图重新强化与苏丹之间的联系。诚然，阿拉伯世界的反抗活动损害了伊朗的一些地区利益（尤其是在叙利亚和真主党控制的黎巴嫩），但是在伊朗对分离势力的支持下，中东的重要国家如巴林、沙特和也门也出现了内部动荡。而这一切的最大受益人显然正是伊朗。

对以色列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伊拉克在未来的走向。众所周知，伊朗一直在支持伊拉克的主要什叶派政党。⁸而那些有志反抗的伊拉克政客也仅仅是依靠着美国的强力支持才得以勉强抵御伊朗的侵蚀。⁹一旦美国撤离伊拉克，还有谁能阻止该国落入伊朗的魔掌呢？在过去数年中，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共和国卫队都积极地在伊拉克境内训练什叶派民兵。随着伊朗地区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伊拉克究竟是会继续追随美国，还是会成为伊朗的附庸，重新加入到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冲突的行动中来呢？伊拉克同以色列的距离并不遥远，从伊拉克边境到约旦河仅有约210英里左右的距离。

外界已经注意到，沙特增强了北方边境同伊拉克接壤地区的军事力量，这显然是考虑到了巴格达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出于同样的原因，以色列也不能排除伊拉克在伊朗的影响下重新参与阿以冲突的可能性。

在1948年、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中，伊拉克都曾长期派出近1/3的地面部队，参与以色列东部前线的争夺。1991年，巴格达也曾再次下令，用导弹攻击以色列城市。

不论采取怎样的形式，一旦以色列东部边境战火重燃（即便只是微小的可能），又怎能期望以色列退回1967年分界线并放弃重要的防御边界呢？

毫无疑问，影响以色列周边安全环境的许多区域局势都不可避免地会在今后发生变化。穆兄会在埃及遭受的失败将完全可能通过在其它阿拉伯国家的胜利得到弥补。威胁以色列安全的周边传统军事力量的衰弱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逆转。一旦特定阿拉伯国家实现了有限的内部稳定，就可能出于保护政权或打击叛乱少数民族的目的重建传统军事力量。国际军火出口商也会乐见中东军火市场的复苏并向该地区输送最先进的尖端武器。

对谈判结果的武断预判正在损害通过和谈实现和平的努力

总而言之，在当前局势下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它完全撤出约旦河西岸并默认可防御边界的丧失，将使这个犹太人国家面临不可接受的巨大战略风险。这些要求同样也与国际社会过去认可以色列无须完全从该区域撤军的承诺相违背。

此外，1993年的奥斯陆协定曾设想巴以双方通过谈判形成冲突的解决方案。两国边境应由双方协商决定，而不应由国际组织或单边行动强加给某一方。事实上，在1995年签订的巴以临时和平协议中，双方就曾明确承诺用谈判解决冲突。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欧盟和俄罗斯的官员也曾曾在协议上签字。他们都是协议的官方鉴证者。

今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巴斯领导下的巴权力机构对于通过谈判解决巴以冲突并无兴趣。截至目前，他们更希望看到国际社会将有利于巴勒斯坦的领土条件强加给以色列，同时却无需在官方层面宣布结束阿以冲突或承认犹太人同样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东和平四方会谈组织应裁定以色列退回1967年边界，从而为外界主导的和平方案创造条件。这种观点符合巴勒斯坦的利益，但却无助于实现真正的和平。欧洲国家对此类动议的支持已经违反了当初在他们的鉴证下签订的和平协议。这种做法只会为巴勒斯坦在联合国采取进一步的单边行动开辟道路（就像他们在2011年9月所做的一样），并对今后可能的任何谈判造成致命的打击。

最后，必须补充的一点是，在过去的15年中，以色列人民已经经历了巨大的痛苦。

而最令人痛心的是，他们满怀热情地欢迎1993年签订的奥斯陆协定，结果换来的非但不是和平，反而是一轮又一轮的自杀性爆炸袭击（目前，已有超过一千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丧生）。

尽管如此，以色列人民仍在承受巨大风险的情况下，支持政府于2005年由加沙地区单方面撤军，但他们却惊讶地发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对以色列人口稠密地区的火箭袭击次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5倍。

以色列人民有权保护自身安全，并确保过去的错误不再发生。

这是他们无可争辩的权力。因此，以色列绝不可能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类似完全撤离加沙地区的行动，尤其是在当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也正因如此，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以色列通过放弃可防御边界来寻求与邻国谈判、实现和平。

注释

1. 何伯·凯农，“黑格发言违背巴以临时和平协定”，《耶路撒冷邮报》，2011年3月30日。

2. 可参考伯纳德·阿维沙伊，“下一步，一份新的巴以和平计划”，《纽约时报》，2011年3月30日。
http://www.nytimes.com/2011/03/30/opinion/30iht-edavishai30.html?_r=1&ref=globalhome&pagewanted=print.

3. 英国1967年驻联合国大使卡拉登勋爵：“我们没有说，以色列应当退回1967年的那条边界线。我们既没有写‘那条’，也没有写以色列应当退还‘所有区域’。我们是有意这样写的。众所周知，1967年的分界线并不是一条永久性的国界线，它只是几十年前订立的一条停火线……我们没有说1967年的分界线必须是永久性的，那太疯狂了。”
麦克尼尔—雷勒报告，1978年3月30日

4. 理察德·霍布鲁克，“和平的宗旨”，以色列有权拥有安全边界：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发布以来的四十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2009年）第45页

5. 大卫·伊格纳蒂乌斯，“盖茨强调中东面临的危险”，《华盛顿邮报》，2011年3月22日

6. 了解有关穆斯林兄弟会极端倾向的更多讨论，请参阅萨蒂·哈密德，“穆斯林兄弟会向激进化转变？”布鲁金斯学会，2010年6月26日；和乔纳森·D·哈勒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他们的自述”，2011年2月6日，《耶路撒冷情咨摘要》，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在被选为约旦穆兄会领袖之前，哈曼姆·萨伊德曾因发表支持奥萨马·本·拉登的言论而为人所知；详情请查看《事件周刊》，2001年9月24日

了解有关叙利亚兄弟会在新领导人领导下采取更加强硬路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诺尔·马拉斯，“兄弟会提升叙利亚影响力”，《华尔街日报》，2011年5月17日

7. 乔纳森·D·哈勒维，“还有谁在批判美国杀了本·拉登？”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博客，2011年5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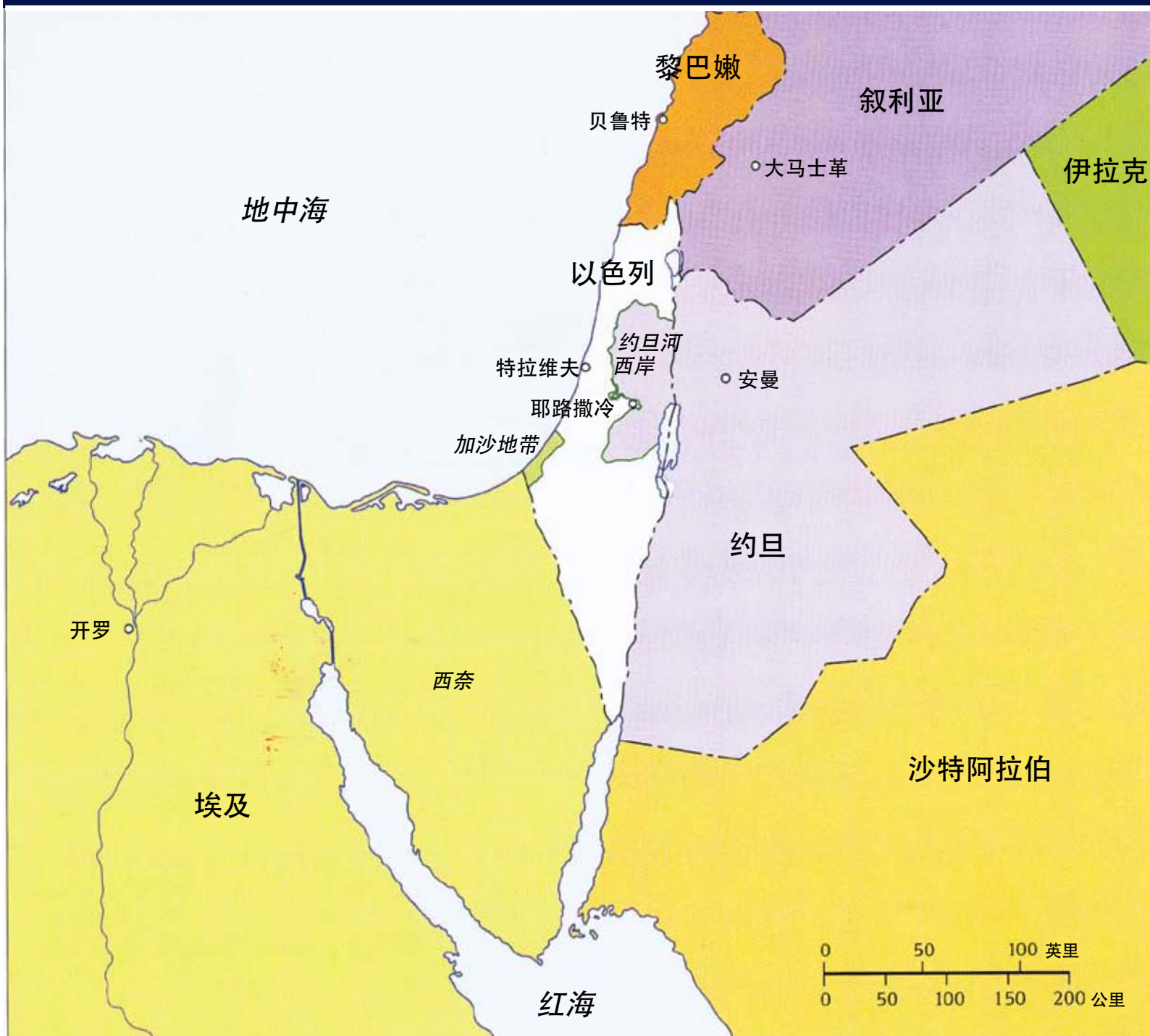
8. 麦克尔·戈登，“邻国介入损害伊拉克稳定”，《纽约时报》，2010年12月5日戈登引述维基解密于2009年11月13日披露的信息称，伊朗每年用于资助伊拉克政治集团的经费高达2亿美元。

9. 费德里克·凯根和金伯利·凯根，“与伊拉克同在”，《旗帜周刊》，2011年4月18日

以色列和中东



1949 年停火线以内的以色列 (1967 年以前的边界)



“揭露本性”带来了后一种结果。

然而，这么做让以色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影响甚至延续至今日。巴拉克提出了一项以土地换和平的新方案，该方案并未基于联合国安理会 1967 年的第 42 项决议。这项决议正是六日战争之后主导了所有阿以和平努力的指导性方案。根据

巴拉克的预想，以色列将被迫在更小的领土上谋求生存。巴勒斯坦领导人则更进一步，在西方国家的决策者心中成功地树立“1967 年边界”——即 1949 年停火线这一概念，并声称这才是未来所有谈判的参照系，显然与本意相违背。

确保以色列未来发展的防卫边界

前以色列国防军
副总参谋长，前
国家安全顾问

乌兹·达杨少将

以色列的 1949 年停火线是无法防守的

在 1967 年六日战争的余波中，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其他一些领土被侵占，以色列在“防卫边界”上的根本利益也就扎根于他所面临的这种特殊的法律和战略环境里。

根据 1949 年停火协议，1949 年停火线——以色列遭受的攻击就来自于其另一侧——只是一条以色列和约旦军队之间的军事分界线，而不是永久性的政治边界。

这个事实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在 1967 年 11 月颁布第 242 号决议的背景，该项决议没有要求以色列国防军（IDF）完全撤回到停火线上。而是得出了以色列需要一条不同于无法防御的战前边界的“安全且被认可的边界”的结论。1967 年前，以色列主要海滨城市和约旦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之间的细长领土最窄的地方只有 8 英里，且无法在遭受侵略时提供战略纵深。

今天，许多人都对一个问题不甚了解，即以以色列曾经十分脆弱，如果强制退回到 1967 年前的边界上，那么他又将恢复原状。

正如在这份政策研究的其他章节里提到的，以色列只是一个小国，面积 1 万平方英里，相当于美国新泽西州，或者说比比来时稍小。

以色列不仅国土狭小，同时其 70% 的人口和 80% 的工业都夹在地中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之间，处在狭长海岸走廊地带。

更糟糕的是，毗邻此地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山丘俯瞰着这片平坦而一览无余的海岸平原。这无论是在侦查、攻击或是防御以色列的地面反击方面都给进攻者提供了非常明显的优势。

沿着以色列的海岸平原，分布着许多打击目标：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跨以色列高速公路（即 6 号线，它呈南北走向，距离约旦河西岸地区仅数十米）、以色列国家输水系统和以色列高压输电线。如果约旦河西岸地区落入敌人之手，则对以色列的国家基础设施是一个持续性的威胁。

因此，从伊格爾·阿倫，到莫西·達楊，再到伊扎克·拉賓，以色列國家安全理念的构建者们都有充足的理由坚持不能退回到脆弱的 1967 年边界上，因为这么做只是在欢迎他国侵略以色列，威胁以色列的未来而不是为和平发展铺路。

这些以色列领导人寻求以色列能据此自我防卫的新边界。这样，在国防机构内达成了一项广泛共识，即把这些新边界称为“防卫边界”并在将来任何谈判中积极寻求这样的边界。¹ 2004 年，美国在信件中承认以色列寻求防卫边界的权利，这封信由乔治·沃克·布什总统签署，并且得到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中两个政党多数成员的支持。

一架商用喷气客机（画圈处）正从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起飞，这是处在附近的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看到的场景。从这个有利的位置发射一枚 SA-7 肩扛式导弹或哈桑式火箭弹即可拦截所有进出以色列的商用航班。

传统攻击的威胁

以色列对防卫边界的需求基于其所面临的四种主要威胁：传统攻击、恐怖主义、迫击炮和火箭弹攻击（包括弹道导弹）以及非常规攻击。说到常规攻击，不同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武装部队，以色列国防军大多数是预备队，这些预备队需要在48小时内才能全面动员。

而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大多数是现役军人，只有很少一部分预备队。防卫边界能为以色列的现役部队提供理想的地形条件，使他们能抵挡住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地面攻击，直到预备队动员完成。

以色列国防军大多数是预备队。防卫边界为以色列的现役部队提供理想的地形条件，使他们能抵挡住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地面攻击，直到预备队动员完成。

预备队动员完成之后，防卫边界也能为以色列国防军在战时额外地提供所需的战略纵深，以组织防御战。如果以色列缺乏这种最低限度的战略空间，那么他的威慑力将被大大削弱；阿拉伯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在短时间快速取得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决定性战果的可能性将大大提升。

考虑到 1948 年，1967 年传统阿拉伯国家曾结成联军，以及 1973 年伊拉克远征军曾在以色列东面展开，防卫边界问题一直受到高度关注。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约旦和以色列达成和平之后，这种威胁在短期内消失了。但是没有人能肯定伊拉克长期局势会如何发展。他或许会变成一个寻求和以色列和平共处的阿拉伯民主国家；或是成为伊朗的卫星国，把伊朗的影响力扩大到整个阿拉伯世界。

没有人清楚将来中东地区的国家关系会如何演进。以色列不能依照现在的中东政治局势来计划他的国防，而必须考虑这片地区未来会如何发展。

应当强调一下，在大规模传统攻击中保证自身安全对以色列依然至关重要。即便是在今天，这个导弹量产的时代，决定战争胜利的最终因素也是陆军，而不仅仅依赖使用空中打击。实际上，美国在 1991 年和 1993 年对伊拉克使用的大规模空中力量并没有迫使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接受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条件。只有当联合军队深入伊拉克领土时，冲突才得以结束。只要陆军还是决定战争

成败的决定性力量，那么影响陆战的因素，例如领土、地形和战略纵深就依然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其实以色列的许多邻国也依然在他们战争体系中强调重装甲部队的地位，以说明陆战是中东地区军事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²

恐怖主义的威胁

自从建国开始，以色列就面临着来自中东各国的，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的威胁，而且现在这个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其领土沿着约旦峡谷和犹太沙漠里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东部边界延伸，所以他能够阻止武器走私和敌军的渗透。因此，约旦河西岸地区没有像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马里那样，成为国际圣战主义者的战场。诚然，成功反击叛乱和恐怖主义的重要先决条件就是孤立作战区域，以切断敌方的任何人力和物资增援。

正如我们在加沙地带看到的那样，无法阻止武器贩卖和恐怖组织的渗透导致了长年的袭击、混乱和外交问题。

火箭弹和迫击炮的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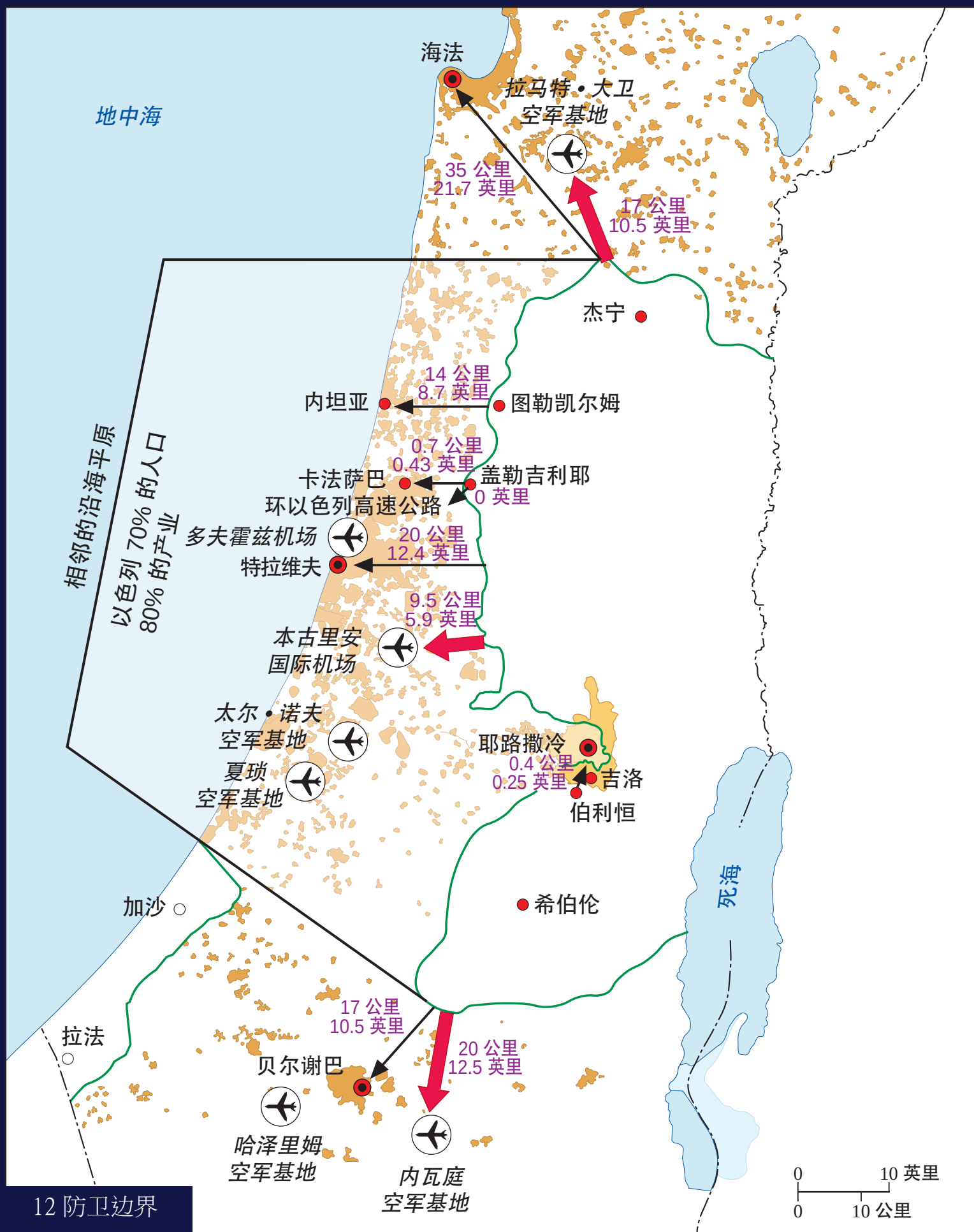
如果恐怖组织像在加沙地带那样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使用迫击炮或火箭弹，则以色列的内地将彻底暴露。

考虑到约旦河西岸地区实际上俯瞰着以色列的主要城市，海拔比特拉维夫这样的人口中心高几千英尺，所以避免迫击炮、火箭炮和地对空导弹被带入约旦河西岸地区就显得至关重要。这种考虑并不仅仅是纸上谈兵，或者仅仅是分析最坏情况：2002 年，基地组织在肯尼亚的蒙巴萨向以色列的商用客机发射了一枚肩扛式 SA-7 地对空导弹。从那时起，哈马斯就铁了心想要往加沙地带走私对空导弹。

短程火箭弹对以色列来说是一项特殊的挑战，它使以色列的狭小领土成了它至关重要的防卫屏障。讽刺的是，以色列的邻国拥有的远程火箭反倒不像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短程火箭那么具有威胁。远程火箭十分昂贵，且需要大型发射场或发射车，而这些目标极易识别。短程火箭，甚至是短程迫击炮则更难定位，尤其是隐匿于平民聚居区时。

同时，它们价格低廉，因此数量庞大。如果以色列要防止有人在脆弱的战略目标附近架设它们，则必须控制这些地区，以使敌军无法威胁关键设施。

以色列自约旦河西岸的战略弱点



以色列的地理位置越脆弱，它所面临的来自中东国家军队的非常规打击和非常规恐怖主义袭击就越猛烈。

非常规武器威胁

现在，中东地区的非常规武器，特别是核武器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这样一个时期，防卫边界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战争来临时，以色列显得如此渺小，以至于它必须将它的人口和财产尽可能地分散，以使敌军认为他们在遭遇以色列的反击之前，无法在第一次攻击中取得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以色列的地理位置越脆弱，它所面临的来自中东国家军队的非常规打击和非常规恐怖主义袭击就越猛烈。在将来，当恐怖分子获得了核恐怖的力量，能以更灵活的方式攻击以色列时，这个问题就会显得更加重要。

约旦峡谷：防卫边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 1967 年起，约旦峡谷就是防卫边界问题上以色列考虑的最重要的一环，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独特的地形特征。从地中海到约旦河，以色列加上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平均宽度是 40 英里左右。约旦峡谷本身的宽度只有 6 到 9 英里，约旦河只比海平面低 1300 英尺，但是它却邻接着约旦河西岸地区山地极度陡峭的东面山坡，而山脊最高点可达海拔 3318 英尺。沿着山峰，以色列设置了朝向东面的前哨站，这样约旦峡谷就成了抵御来自 3000 到 4600 英尺高度的袭击的天然屏障。同时，这片区域也是极少有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耕地。再者，这里只有五条供攻击部队通行的通道，这些通道即使是以色列数量不多的常备军也可以轻松防守。因此，在极为不稳定的中东地区，约旦峡谷被看做是以色列的防御前线。

考虑到约旦峡谷在以色列国防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近几十年来以色列国防军在此地布置了数个旅的部队用于防御，并且在面临来自东面的大规模地面攻击时，还可以获得预备队的增援。以前，以色列会预先在约旦峡谷布置供这些部队使用的装备物资。后来在和巴勒斯坦的谈判中，以色列也寻求确保经由具备战略地位的东西走向的公路将部队运送到约旦峡谷的权力。在很多情况下，约旦峡谷的以色列军队是在遭受袭击时全面动员预备队的总开关。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前总理伊扎克·拉宾在他 1995 年 10 月最后一次议会演讲时说，无论以色列签订什么和平协议，都必须保证对约旦峡谷进行“最广泛意义上的”控制。

为什么以色列不依赖军事情报来防备即将发动的攻击，以便后备队能及时动员，制止任何潜在的地面攻击？同时如果这么做，以色列便不再需要在约旦峡谷设置前线部队？1973 年赎罪日战争中，面对埃及和约旦的前线部队，以色列国防军相信他们能及时获得情报支持而一直维持着数量劣势。最后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当时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组织了突然袭击，完全出乎以色列军事情报的预测。

为什么以色列不依赖军事情报来防备即将发动的攻击？在 1973 年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相信他们能及时获得情报，但是这最终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情报预警会出问题的一个原因是难以预测中东国家的政治倾向。

例如，表面上约旦毫无疑问地是以色列和平的关键伙伴。但是在其近代历史中，却有两次因为中东地区局势的突然变化和扩军，从而给高层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敌视以色列。1967 年，侯赛因国王成了针对以色列的阿拉伯联军的最后一名成员，并允许外国军队进入该国参加战斗。

在 1990 年伊拉克对科威特先发制人地发动攻击时，约旦国内有很大的呼声，要求站在萨达姆·侯赛因一边。1989 年，伊拉克的侦察机获准进入约旦领空，拍摄以色列境内的潜在打击目标。以色列无法因为假定来自东部的袭击已经消失，或相信以色列国防军可以迅速动员应付这些袭击从而放弃约旦峡谷。

事实上，依赖预备队增援以色列东部前线的做法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正如前面提到的，以色列的邻国拥有大规模的现役部队，预备队只占很小一部分。尽量延长以色列预备队的动员时间，使自己在更长时间内具备数量优势对他们非常有利。通过运用导弹打击集合地点和预备队装备仓库，甚至可以中断预备队的动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可以预料邻国会为此动用他们的远程弹道导弹和远程火箭弹储备，阻止足够多的增援到达包括约旦峡谷在内的任何以色列前线地区。

一些观察家建议，以色列可以依靠其空中力量消灭敌军，这样一来也不再需要一条理想的防线了。但是在任何以色列将会面对的与之相似的战场上，以色列空军都有比密接支援更优先的任务。首先，他们要摧毁敌方的空中防线，以取得制空权。

与强势巴勒斯坦 对峙下的以色列 之地理地形弱势

以色列沿海平原相邻的哈德拉到约旦河西岸，容纳以色列 0 的人口及 0 的产业。



其次，他们要压制瞄准以色列大城市发射的弹道导弹。而弹道导弹和火箭弹的运用会使地面部队和战略纵深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因为它们会使以色列的后备队不能及时赶到战场，少量的常备军将被迫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战斗更长时间。以色列的常备军同时也被迫在因空军忙于其他任务而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战斗相当长的时间。

在以色列有了在加沙地带的经历后，约旦峡谷便显得极端重要了。1994 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执行了奥斯陆协议，在加沙地带南部和埃及的西奈半岛之间建立了一条安全区。它被成为“费城走廊”，在某些关键地区只有 300 多英尺宽。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利用这条狭窄的走廊在地下建立了许多走私隧道，将火箭弹和其他武器从西奈半岛上拉法赫城的埃及控制地区走私到巴勒斯坦控制地区。以色列打击过这些隧道，但收效不大。最终在 2005 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包括费城走廊彻底撤离。

以色列放弃费城走廊后，武器走私的规模急剧膨胀，加沙地带变成了距离更远的火箭炮的发射场，对以色列的人口中心有着致命威胁。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扩大走私范围，从伊朗、也门和苏丹进口武器。

哈马斯的特工可以从加沙地带飞去德黑兰，在那里接受革命卫队的训练后再回到加沙组建巴勒斯坦军队。与此同时，也有数千埃及人靠走私网络谋生。如果走私停止，那对他们绝无好处。

约旦峡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费城走廊。

尽管这里的地下隧道与费城走廊并不相似，但约旦峡谷却比费城走廊更长，使得走私手段更多样化。如果以色列要求以后任何形式的巴勒斯坦国都要保持非武装化，以防止它像加沙地带一样成为另一个伊朗支持下的堡垒，那么以色列保证非法武器不进入国内的唯一手段便是维持对约旦峡谷的控制，从根本上阻止违法武器的进入。

以色列控制约旦峡谷也对约旦的安全有着潜在的重要意义。

如果以色列国防军从约旦峡谷撤离，那么阻止走私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约旦军队头上。当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再也不从东面封锁约旦河西岸地区时，许多地区恐怖组织可能就会利用以色列的这个新弱点，在约旦境内建立前线基地。这会增大约旦的国防压力，给他们带去新的威胁。

以色列的防御线：
约旦峡谷及约旦河西岸
山脊东部陡峭的斜坡



事实上，在 2007 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突袭，然后在安巴尔省遭遇基地组织并失利之前，基地组织就已经开始在伊尔比德等约旦城市建设分部，雇佣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了。如果以色列从约旦峡谷撤离，那么这片地区就会马上吸引地区恐怖组织纷至沓来，寻求渗透约旦河西岸地区，加入哈马斯和以色列战斗。无论是基地组织、伊拉克人或是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如此。

如果以色列从约旦峡谷撤离，那么这片地区就会马上吸引地区恐怖组织纷至沓来，寻求渗透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入哈马斯和以色列战斗的机会。

导致恐怖组织在约旦王国内扎根，而这会危害约旦的国家安全。上一次约旦成为攻击以色列的基地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1970 年，侯赛因国王摧毁了许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主义设施，并引发了约旦内战，因为他们威胁了约旦王国的稳定，威胁了防卫边界，威胁了耶路撒冷。

防卫边界和耶路撒冷

在以色列国内，耶路撒冷地区尤其需要防卫边界。1967 年前，耶路撒冷坐落在一条从以色列海岸平原延伸出来的狭小走廊的末端。以色列的首都三面受敌，甚至毗邻城市的西侧入口，走廊只有数英里宽。

从地形上来说，耶路撒冷被崇山峻岭环绕，进入这座城市的路线极为有限。例如，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贝特伊卡萨村距离耶路撒冷 - 特拉维夫高速公路主干道只有一百多英尺，而这将以色列连接两个最大城市的主要运输干线暴露在潜在的敌军步枪火力之下。1967 年，约旦军队利用耶路撒冷周围居高临下的地形，向城内的犹太人发射了 9000 多枚炮弹。

在 1967 年后，出于防御上的考虑，以色列为永久占领首都周围占据优势地形的山地做出了努力：在北面建造吉瓦特泽夫聚居点，在南面建造古什埃齐翁聚居点，在东面建设马阿勒阿杜明市。

马阿勒阿杜明市同时也位于一条十分重要的东西走向的战略公路上，通过这条公路，以色列能在战时向约旦峡谷运送增援。它对以色列维持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以及统治耶路撒冷至关重要。

另一个防卫计划？

根据这个过去曾提出过，但被巴勒斯坦人拒绝了提议，以色列可以在约旦峡谷的巴勒斯坦控制地区布置军队，建立前哨站。然而即便巴勒斯坦人接受了以色列的军队布置，也难保他们能忍耐多久不动手。因为历届巴勒斯坦政府都对破坏巴勒斯坦国内的以色列据点十分热衷。况且，以色列军队向来就是巴勒斯坦国内政坛上的引雷针。

进一步说，以色列在约旦峡谷的安全利益不能依靠把这片地区交给巴勒斯坦人，然后在这片地区里布置国际维和部队来得到满足。（这个问题在这篇研究中雅科夫·米德罗尔少将所写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国际维和部队的风险”一节里有更详尽的叙述）以色列的国防理念的根基就是自己独立完成，并且在这一点上以色列有充分的理由。以色列接受了国际观察员审查已签订协定执行情况的要求，但是一般都会拒绝有关驻扎外国军队的要求——包括美国军队——这会让外国军队，而不是以色列军队遭受危险。况且，以色列和国际组织之间曾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在 2006 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没能如以色列期待的那样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重新武装；同样地，欧盟的观察员在 2006 年遭遇加沙地带本地居民的叛乱时即从拉法的边境地区撤离了。

作为领土折衷方案的一部分，以色列应当寻求取得约旦河西岸地区具有关键军事意义的地点的主权，而不是在国界之外建立无法长期维持的防卫设施。这也是联合国安理会 242 号决议的初衷，这项决议并不要求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地区完全撤离，反倒是在考虑到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基础上确立了新的边界线，也确保了将来的所有和平协议能够得以维持。为了让以色列获得长期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战略纵深，约旦峡谷必须成为以色列的东部边界，以构建真正的防卫边界。

注释

1. 伊格尔·阿伦，“以色列：防卫边界问题”，《外交问题》，第五十五卷之一（1976 年 10 月）
2. 安东尼·柯德斯曼，《不平衡战争时代的阿拉伯 - 以色列军事力量》（帕罗奥图，加拿大：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
3. 4600 英尺的最高地点是根据死海负 1300 英尺的海拔（地球陆地最低点），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山脊在巴尔·赫兹尔的最高峰的 3300 英尺海拔之间的差距计算出来的。

捍卫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合法权利

多尔·戈尔德博士

以色列前驻联合国大使、现任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主席

在近代历史上，评判一个国家标准并非其军事实力或经济表现，而是其针对正义事业的内心信念。44年前，适逢1967年的“六日战争”结束之时，以色列伞兵到达西墙，指挥官莫塔·吉尔 (Motta Gur) 宣布“占领圣殿山 (Har Habyit Beyadainu)”，毋庸置疑，以色列发动了一场正义的战争。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色列在海外的代表，如：阿巴·埃班 (Abba Eban) 和哈伊姆·赫尔佐克 (Chaim Herzog)，在联合国大会前一再重申对于耶路撒冷的权利，尽管可能无法得到长久的支持，但至少他们保卫耶路撒冷的决心被众人所熟知。

然而，自此引发了许多争议。

虽然这些争议有一定意义，但依然难以逃脱被遗忘的命运。因此，耶路撒冷始终处于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

虽然以色列有合法权利保留一个统一的城市作为其首都，但是有一种氛围表明该权利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事实上，围绕着为什么以色列应默许耶路撒冷重新划分而出现了诸多争论。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爵士所说，耶路撒冷一直被看做是一个“犹太人”历史权利的“缩影”，而这令麻烦逐步加剧。1在公元70年代犹太人失去了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国家主权，正是耶路撒冷的陷落，标志着这个犹太国家的结束。另一方面，在十九世纪中叶犹太人恢复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领土，并在恢复其他祖先领土之前。他们对犹太国家的复兴运动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例证了耶路撒冷的确为犹太国家整体运动的中心。

总之，耶路撒冷一直是犹太人民族自立想法的焦点。Ernst Frankenstein，一个战争期

国际法的英国权威，在犹太人合法权利的争论中指出，他们期望恢复他们的家园，在罗马征服后也从未放弃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已发生的，罗马和拜占庭的继任者不得不在“连续并不受干扰地占有”的土地没有任何所有权的表示。然而，犹太抵抗运动持续了几个世纪，其中大部分是为了解放耶路撒冷。²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事实上，犹太人从未放弃过他们祖先的家园，他们的历史脉络为他们的主张和历史权利提供了基础。³ 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那些撰写犹太法律的人要求以色列的土地。在黑石纪念馆，一份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美国最高检察官、大学校长及国会议员 Melville Fuller 签署的文件在1891年被提交给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前，巴基斯坦一直被特征为犹太人“不可分割的占有”，“自从他们被暴力驱逐。”⁴

总之，他们没有资源放弃他们的土地或者忘记自己的权利。这是最热切的表示，通过几百年来对耶路撒冷破坏的哀悼以及恢复的祈祷。

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对于以色列土地的历史脉络的焦点。

和以往一样，这正是必须要了解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权利的原因。

这也正是近年来有必要确定旨在削弱这些权利的争论以及支撑这些争论的信念，从而为了子孙后代保护耶路撒冷的原因。以上内容简要回顾了以色列人民对耶路撒冷的历史性权利在十九世纪的呼声，此外还将全面阐释以色列在现代获得的全新的合法权利。

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国际权利的现代来源

1970 年，即 1967 年“六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在最负盛名的国际法律期刊《美国国际法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直接阐述了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权利问题。⁵这成为随后几十年中以色列大使在联合国发言以及各自演讲中的重要参考点。该文章由颇具实力但当时尚未知名的法律学者斯蒂芬·施维贝尔 (Stephen Schwebel) 撰写。在后面的几年中，随着被任命为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并最终成为海牙国际法院的院长，施维贝尔的地位飞速提升。回想一下，他的法律意见颇为重要，值得慎重考虑。

施维贝尔撰写了《征服的重心》，一次回应国务卿威廉·罗杰斯 (William Rogers) 在 1967 年之前关于以色列“无实质性改变”的言论。尼克松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发言及表决方式也表明美国的耶路撒冷政策的开始变得强硬。施维贝尔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他在文中表示，战前的界线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因为 1967 年的界线不属于国际边界。按照正式说法，这仅仅是 1949 年之后的停火线。他指出，停战协定本身并未消除各方超越这些界线的领土要求。值得关注的是，他解释说，如果通过战争手段获取领土，则围绕冲突爆发的环境将直接影响双方的合法权益，直至冲突结束。

1967 年之后的两个突出的事实影响了他的思想：

首先，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合法地行使了自己的自卫权。熟悉战争爆发原因的人们应该可以回想起，埃及才是掀起敌对行动的罪魁祸首，该国采取了一系列激化矛盾的措施，其中包括关闭通往以色列的蒂朗海峡航线以及宣布封锁埃拉特，上述行动被外长阿巴·埃班 (Abba Eban) 定性为“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尽管以色列不断发布警告，但沿着以色列的东部战线，约旦的炮火袭击了耶路撒冷的平民居住区。

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并没有侵占别人的领土，而是遭受了武装袭击。事实上，苏联曾经在 1967 年 6 月 14 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以及 1967 年 7 月 4 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试图将以色列诬陷为侵略者。

但莫斯科的图谋并未得逞，在安理会上被多票否决 (11-4)。同时，在联合国大会上，针对苏联提案的第一轮投票中，88 个国家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 (只有 32 个国家表示支持)。显然，联合国的大部分成员国都认为以色列发动了一场保卫战争。⁶

施维贝尔观点中的第二个要素是，约旦关于在“六日战争”中丢失给以色列的领土的法定所有权声明存在诸多问题。约旦早在 19 年前，即 1948 年，就曾经非法入侵过西岸地区 (包括耶路撒冷)。施维贝尔强调说，

从法律角度来看，由于“不法行为不得产生权利 (ex injuria jus non oritur)”，因此在随后的几年中，约旦并未获得对该地区的合法权利。所以，约旦对西岸主权的声明并未得到除了巴基斯坦和英国之外任何国家的认可，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是英国，也并不承认约旦对耶路撒冷本身的主权宣示。

因此，通过约旦非法入侵西岸地区和以色列合法行使自卫权之间的对比，施维贝尔总结说，在巴勒斯坦曾经统治过的领土上，以色列比任何参战的阿拉伯国家都“更加师出有名”。他明确指出，以色列在法律方面更有权“拥有整个耶路撒冷”。

施维贝尔参考了 1967 年 11 月 22 日的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从 1979 年的《埃以和平协定》到 1993 年的《奥斯陆协定》，多年来以色列所有的和平努力皆以该决议为根本。在著名的“撤军条款”中，第 242 号决议并未要求以色列从其在“六日战争”中占领的所有领土中全部撤离。实际上，如前所述，这些地区无需完全恢复原状，因为那只是 1948 年阿拉伯军队非法入侵的产物。

曾于 1967 年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亚瑟·哥德堡 (Arthur Goldberg) 在 1980 年指出，第 242 号决议甚至没有提及耶路撒冷，“该遗漏是有意为之的”。哥德堡的观点反映了他曾就职的约翰逊政府的政策，即他从未将耶路撒冷描述为“被占领土”，虽然该政策在尼克松总统任下发生了改变。⁷ 鉴于哥德堡先前曾任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因此其关于第 242 号决议的书面论述颇具分量。

事实上，在国际法和外交领域的领先法学家中，施维贝尔显然应者云集。他得到了伟大的澳大利亚法律学者朱利叶·斯通 (Julius Stone) 的支持，后者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补充说，1947 年联大第 181 号决议 (也被称为“分区计划”) 并未削弱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后续主权声明。诚然，第 181 号决议曾设想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将成为一个独立主体，或独立的国际实体。但是，第 181 号决议仅仅是联大的建议。而且，该决议被 1948 年强行入侵新生国家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野蛮否决了。

最终，联合国的独立主体设想从未能得见天日。联合国未能保护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民免受阿拉伯军队的入侵。

鉴于这段历史，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 (David Ben-Gurion) 于 1949 年 12 月 3 日宣布，第 181 号决议对耶路撒冷的论述是“无效的”，并预测了若干年后斯通的法律分析。⁸

剑桥大学的伊莱休·劳特派特 (Elihu Lauterpacht) 也持有相同观点，他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澳大利亚法律顾问以及海牙国际法院的专案法官。

劳特派特认为，以色列在 1967 年统一耶路撒冷是合法有效的。⁹ 他解释说，对耶路撒冷拥有主权的最后一个国家是在 1517 年至 1917 年期间统治该地的奥斯曼帝国。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在 1920 年的《塞夫勒合约》中正式放弃了其在耶路撒冷的主权及其在现今土耳其南部的所有领土。该放弃得到了土耳其共和国以及 1923 年《洛桑条约》的确认。按照劳特派特的观点，此后耶路撒冷的主权应归属主要的协约国，并转交给国际联盟。

但随着国联解散，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联合国未能根据 1947 年的《分区计划》在耶路撒冷创建一个独立实体或一个特殊的国际政体，劳特派特总结说，最终悬而未决的主权被搁置在一旁。换言之，截至 1948 年，耶路撒冷处于他所说的“主权空置”时期。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早在 1947 年前期的犹太事务局接受了第 181 号决议，是否意味着以色列主动放弃了对耶路撒冷的主权宣示。然而，根据该决议，耶路撒冷的特别国际政体的持续时间“尚处于十年期限的第一阶段”。该决议设想在城市中进行居民公投，以此表达“他们变更城市政体的意愿”。¹⁰ 犹太人领导层认为独立主体是一项可以更换的临时安排。他们相信犹太居民在此期间会选择成为犹太国家的公民。此外，他们还希望公投可以让独立主体在十年后加入以色列国家。¹¹

那么，在劳特派特描述的“主权空置”期间，谁可以获得耶路撒冷的主权呢？当然，鉴于第 181 号决议，联合国并不适合。劳特派特的答案是，以色列可以填补“主权空置”，因为在该地区以色列国防军必须存在，以保护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免受袭击或种族清洗。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 1967 年，当时约旦军队再次对以色列居民区开火，以色列国防军进入耶路撒冷东部地区，包括老城区，进行自卫反击。

第四位在这场争论中支持以色列合法权利的法学权威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前院长以及约翰逊政府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 (Eugene Rostow) 教授。罗斯托分析以色列权利问题的出发点是巴勒斯坦的托管，其专门提到了“犹太人民与巴勒斯坦的历史关联”奠定了“在该国重组本国家园的根基”。

这些权利同样适用于耶路撒冷，因为托管并未将耶路撒冷从其他已成为犹太人家园的领土中隔离出来。

罗斯托对比了其他国际联盟的托管地和巴勒斯坦托管。不同于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托管地赢得了当地居民的信任，巴勒斯坦托管地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它支持犹太人民的民族权力，但仅仅保护英属巴勒斯坦托管

地中非犹太居民的民事和宗教权力。¹² 对此应该补充一点，巴勒斯坦托管地其实是国际联盟和作为托管国家的英国之间达成的采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形式的法律文书。

罗斯托认为，托管并未在 1947 年结束。他解释说，犹太人对这块纳入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领土拥有合法建造家园的权利，在国际联盟解散后继续保留，并被联合国载入《联合国宪章》第 80 条中。¹³ 显然，在考虑了罗斯托的论点后，以色列在维护其在以色列的权利方面获得了极为有利的地位，并且填补了劳特派特所描述的“主权空置”。

为什么所有这些法律意见都非常重要？

会有人问：各位学者的法律意见都具有何种重要性？为何如此重要？对于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合法主张权利而言是否重要？

国际法不同于国内法——没有全球政府有权立法。那么该如何确定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当然，可以参考相关条约和国际惯例。海牙国际法院 (ICJ) 明文规定，“各个国家最高水准的国际法学家的教义”可以作为备受国际法庭倚重的国际法的四大来源之一。

简言之，著名国际法专家在 1967 年“六日战争”之后的著作最具权威说服力。

涉及到捍卫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权利，他们的著作进行了非常清楚的阐述。以色列可以合法主张耶路撒冷的主权。当然，这并未排除联大拒绝以色列的论点，并否决其法律权利。然而，如果对比一下相关的国际法权威巨擘在“六日战争”后的著作以及联大的不具约束力的决议，那么施纬贝尔和劳特派特的著作将大获全胜。

在随后几年中，以色列维护统一的耶路撒冷的权利已经不言自明。1990 年，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参议院并发第 106 号决议，并承认“耶路撒冷是并应持续是以色列的首都。”这表明其支持耶路撒冷继续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城市”。它承认，自耶路撒冷被以色列统一以来，宗教自由得到了保障。1992 年和 1995 年通过了更多类似的国会决议。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合法权利基本上无可置疑。此外，这些权利并不只是理论，而是拥有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削弱以色列权利的努力

然而，此类关于以色列主张统一耶路撒冷的合法性的讨论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以色列的合法案例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为何以色列反对如今在耶路撒冷进行的外交斗争呢？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削弱了以色列在该问题上的地位？造成这种变化的是巴勒斯坦娴熟的外交，还是以色列民意的转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今要捍卫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权利，首先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十七年中大量针对耶路撒冷的关键误解在西方外交界以及国际媒体中占据重要位置。部分误解其实来自谣传。其他误解则是有意歪曲过去的谈判结果，以误导公众。

无论其来源如何，这些误解为那些试图削弱并打压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地位，以迫使其考虑做出二十年前难以想象的让步的人们提供了政治弹药。以色列的外国政策已经成功保护了耶路撒冷数十年，但它的外交装甲已经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攻击下出现了裂痕。

1. 歪曲以色列的立场：20 世纪 90 年代逐步扩散以色列准备放弃耶路撒冷东部的谣言

当以色列在 1993 年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后，自 1967 年以来首次同意把耶路撒冷作为未来谈判的议题之一。这并不意味着总理伊扎克·拉宾 (Yitzhak Rabin) 计划分割耶路撒冷。但当时巴勒斯坦领导人却庆祝以色列默许把耶路撒冷摆上谈判桌。

当时巴勒斯坦的部长及谈判代表纳比尔·沙阿斯 (Nabil Shaath) 评论说：“在该谈判中，以色列从未接受把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纳入永久地位谈判的议程中。”费萨尔·侯塞尼 (Faisal al-Husseini) 作为从未将耶路撒冷事务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关联在一起的部长，也评论说：

“在《奥斯陆协议》中，明确指出耶路撒冷的地位可以出现在最后安排的谈判中，如果这时候你说了‘是’，那么一旦你‘同意’谈判，就表示你准备好妥协了。”

客观来说，拉宾并未接受这一立场。他最大的功绩是，在 1995 年 10 月 5 日，他遇刺前一个月，他向议会详细介绍了针对巴勒斯坦的永久地位安排，其中他表示：

“首先，统一的耶路撒冷，包括 Ma'ale Adumim 和 Givat Ze'ev 两个定居点，将作为以色列的首都，接受以色列的主权管理，同时保障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信仰人民按照各自的习俗和信仰而自由出入和参拜圣地的权利。”简言之，拉宾同意了两年前的《奥斯陆协议》，并坚决反对重新划分耶路撒冷。

事实上，拉宾在处理耶路撒冷问题方面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他秘密地与约旦谈判，达成了著名的 1994 年《华盛顿宣言》，认可了哈桑王族作为圣殿山上穆斯林圣地的保管人的传统角色。

以色列对约旦在伊斯兰领域的角色的认可被纳入了《以约和平条约》。

拉宾设想的约旦在耶路撒冷的角色定位与主权划分毫无关系，而是仅限于严格的宗教职能。该设想的可行性取决于约旦反对巴勒斯坦入侵以维护该角色的决心。然而，无论如

何澄清拉宾的立场，依然出现了一个愈演愈烈的谣传，即以色列自己准备在主权方面做出让步，而拉宾从未表达过这种意图。

2. 非官方联络人谣传：在西方散布存在一个划分耶路撒冷的可行性公式

随着耶路撒冷被界定为需要未来谈判的议题，整个知识产权行业一直在忙着证实巴以之间存在关于耶路撒冷的交易。

例如，1995 年 10 月 31 日达成的《贝林-马赞协议》。

通过这些非官方联络通道提出的观点是，巴勒斯坦把以色列划定的耶路撒冷市区边界以外的阿布迪斯村作为首都，而内部市区被界定为约旦治下的耶路撒冷郡 (muhafiz)。

这些谈判借助在从《纽约时报》到《Ha'aretz》等最重要媒体平台上的创新表现而风靡全球。这真的很有趣，让我们回头看看 1996 年 8 月 1 日的《纽约时报》上都写了些什么，“巴勒斯坦让步在东耶路撒冷建都”。文章后面还提到了一份报纸的报道，表示未来将对东耶路撒冷的主权进行谈判，可惜根本没人看到过这份报纸。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认为可以找到一个和平的方式，用以解决巴以在极端棘手议题方面的分歧。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也被说服，并在 1997 年 9 月 22 日撰文表示，基于巴勒斯坦在阿布迪斯建都的耶路撒冷最终决议“已经制定”。丹尼斯·罗斯 (Dennis Ross) 在回忆录中写道，《贝林-马赞协议》证明“即使最棘手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巴勒斯坦领导人从未把阿布迪斯视为可以接受的其对耶路撒冷主权宣示的替代品，而是把其视为临时的桥头堡，以此促进其达到真实的目标：耶路撒冷老城区。此外，这些协议的真实性和也很值得怀疑。无论是拉宾还是佩雷斯，均未批准过此类内容。亚希尔·阿拉法特 (Yasser Arafat) 把未签署的贝林-马赞交流称为“未来谈判的基础”。

一如既往，阿拉法特试图获得以色列的让步，但巴勒斯坦却不执行任何实质性的承诺。更重要的是，他还试图把以色列拖入针对耶路撒冷的更为具体的谈判，从而铺平让以色列在未来做出更多让步的道路。

到了 1999 年 5 月，马赞 (Abu Mazen) 在巴勒斯坦电视节目中现身，让自己彻底脱离了非官方渠道联络人的身份。他宣称，“没有文件，没有协议，什么都没有。”¹⁴ 尽管如此，这些非官方联络人留下的信息依然激发了人们对若干年后以美谈判的想象力，他们在 2000 年满怀信心地赶往戴维营，期待巴以冲突，尤其是关于耶路撒冷的争议已经得到解决。

即使谈判失败了，弥补耶路撒冷分歧的谣言依然存在。戴维营峰会在 2000 年 7 月休会以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随后于当年年末在塔巴举行了会晤。

塔巴会谈结束后，以色列外长什洛莫·本·阿米 (Shlomo Ben Ami) 接受了以色列电台采访，并断言当事双方“从未如此接近达成协议。”以色列记者询问加沙安全长官穆罕默德·达赫兰 (Muhammad Dahlan)，双方是否真的从未如此接近达成共识。达赫兰用希伯来语回应说：“一派胡言 (Kharta barta)”。本·阿米的巴勒斯坦同僚阿布·阿拉比达赫兰更了解外交事务，但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现在已经明确了，双方之间的分歧从未如此显著。”¹⁵

事实上，在欧盟发布的塔巴会谈摘要中，大使米格尔·莫拉蒂诺斯 (Miguel Moratinos) 透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甚至未能就谁拥有西墙主权达成共识。迄今为止，依然有人坚信可以达成关于耶路撒冷的交易。虽然这种谣传源自人们对巴以外交历史的误解，但如今依然误导着全球范围的决策者。

3. 创建过往外交记录的准合法性：由于过去的谈判中曾经提及，因此以色列愿意划分耶路撒冷？

关于耶路撒冷的谈判失败了，并且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但依然严重削弱了以色列针对连续政府的主权宣示。前总理巴拉克 (Ehud Barak) 的外交尝试基于一个安抚以色列方面的原则：“除非一切达成共识，否则没有任何共识。”这种方式假定，如果巴拉克希望用划分耶路撒冷的想法试探巴勒斯坦，而如果没有达成整体协议，那么这种想法将在谈判桌上被踢出局。

秉持这一理念，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于 2000 年 12 月 23 日在白宫提出了其著名的和平解决“参数”，其中包含一项沿着民族宗教线划分耶路撒冷的提案，他指出：“这些都是我的个人想法。如果无法接受，可以从谈判桌上拿走，随着我一起离开办公室。”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承诺，因为克林顿拒绝将他的“参数”带到联合国安理会上，并通过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锁定以色列政府做出他们需要的让步。¹⁶

克林顿提案的核心是一个听起来简单，实则对耶路撒冷来说是一场灾难的想法：“总的原则是，阿拉伯地区属巴勒斯坦所有，而犹太人地区属以色列所有。

这同样适用于老城区。”实际上，如果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博弈的棋盘，那么克林顿的计划将把每个棋格置于不同的主权之下。

不出意料，以色列安全机构彻底绝了克林顿计划。

2000 年 12 月底，以色列的参谋长莫法兹 (Shaul Mofaz) 中将告诉巴拉克政府：“克林顿的架桥计划不符合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一旦接受该计划，将危及到国家安全。”¹⁷他特别警告说，克林顿计划将把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居住区变成难以保卫的巴勒斯坦主权领土的飞地。

莫法兹并非自言自语，而是面对整个以色列国防军发表了上述讲话。这些结论并不是什么秘密，已经成为了《以色列日报 (Friday Yediot Ahronot)》的头条新闻。尽管如此，以色列人民略感安慰的是，克林顿参数备受以色列国防军首脑的谴责，而以色列国家并未以任何方式受到该参数的法律约束。

遗憾的是，这些正式文件也变成了虚构的故事。事实上，2001 年布什政府通知沙龙政府，克林顿参数已经退出舞台了。但是，许多前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官员依然在幕后鼓吹该理念。他们开始大唱赞歌，“我们可以通过大纲了解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大纲包括重新划分耶路撒冷。这些想法并未获得总理沙龙领导的新一届以色列政府的支持。布什政府也不提倡该理念。但是，这些理念在获得良好资助的研究机构以及华盛顿首都区域的智囊团中留存了下来。

例如，2003 年 6 月现身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杰 (Sandy Berger) 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表示，“我相信我们在戴维营讨论的概要随后将在 12 月列入克林顿计划，甚至会进一步在塔巴发展成为我们将要实施的纲领。”2003 年这些想法也在《日内瓦倡议》中浮出水面，虽然这并不能代表以色列政府的官方立场，但是依然保留了划分耶路撒冷的激进理念。

“我们都知道这才是解决方案的纲要”横空出世，成为极具争议的话题。这些论述背后的基础假设是什么？我们如何知道？任何人做出这种断言的确定性有多大？以色列签署过任何协议吗？是否会迫使自身在耶路撒冷上做出让步？没有深究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阿以外交为何失败，并进行重新评估以及想出不同的方法，而是由前任政府官员深挖在戴维营和塔巴提出的观点，并试图对包括耶路撒冷问题在内的想法大唱赞歌。积极地把以色列与失败的谈判外交记录以及上届以色列政府做出的让步绑定在一起，这些人员似乎存在共同的利益链。

在此期间，这些提案从华盛顿的智囊团以及研究机构通过后门渗透到了官方层面。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这确实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华盛顿办事处私下举办了许多会议、研讨会和午餐研讨会，前官员及其继任者都混迹其中。上世纪 90 年代外交部的退伍军人以及政治新星也纷纷来到华盛顿。

总统候选人也在为自己未来的立场寻求建议，戴维营和塔巴的记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全新的传统智慧，仅此而已。最近外交政策专家分享的一种必然性是指，耶路撒冷必然会被重新划分，而以色列统一该城市的历史权利将被遗忘。

巴勒斯坦谈判代表推动了该进程。美国 2008 年大选结束后，他们把过去与奥尔默特总理的会谈记录摘要发给了即将上任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团队。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提交给奥巴马总统的一份 11 页的文件中概述了这份材料。这是一份正式签署的巴以协议吗？非也。但正是基于此材料，巴勒斯坦声称需要将谈判恢复至上一次破裂的地方，听起来似乎新的以色列政府已然接受上届政府在耶路撒冷等问题方面做出的让步。例如，2009 年 9 月 16 日的美巴会谈中，埃雷卡特 (Saeb Erekat) 质问美方代表戴维·黑尔 (David Hale)：“为何不‘恢复’双方曾经放弃的谈判？”

中东问题特使乔治·米切尔 (George Mitchell) 妥善应对：“我们愿意‘重启’，然而此前并未达成协议——除非一切达成共识，否则没有任何共识。”¹⁸

4. 犹太人成为耶路撒冷后来的殖民主义者

反对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宣示主权的最普遍说法是，犹太人是外来民族，是圣城的后来者。瓦利德·哈利迪 (Walid Khalidi) 教授是最突出且口才最好的巴勒斯坦历史学家之一，2009 年 11 月 30 日他曾在联合国委员会面前表示会考虑耶路撒冷的问题。遗憾的是，他肆意发挥了巴勒斯坦人的叙事能力，把优劣势对耶路撒冷的控制权置于伊斯兰与西方的斗争之中。以色列重新统一耶路撒冷的努力被他定性为“代表西方的新十字军东征”。出自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移民和殖民被他定义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¹⁹

哈利迪的言论掩盖了一个简单的真相，根据英国的领事记录，早在 1863 年，而非 1948 年或 1967 年，犹太人就已经成为耶路撒冷占绝对优势的大多数民族。²⁰

普鲁士领事馆曾经报道过犹太人在 1845 年已经成为多数群体，当时犹太人组成了耶路撒冷最大的宗教团体。耶路撒冷的这种转变早在一战中大英帝国到达这里并发布了《贝尔福宣言》之前就已形成。它甚至早于西奥多·赫尔茨 (Theodor Herzl) 倡议以及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事实上，1941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耶路撒冷的总人口数为 65,000 人，其中有 45,000 名犹太人。²¹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占多数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尽管面对身体上的伤害以及奥斯曼帝国针对非穆斯林居民征收的歧视性税费，

但犹太人依然坚持回到他们几百年前的古都。19 世纪中叶，巴格达和大马士革还是阿拉伯城市，但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座犹太城市。实际上，仔细阅读托管文件后可以发现，英国和国际联盟已经充分认识到，犹太人的权利并非随着一战的到来才建立的。托管本身是指基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历史关联”而预先存在的犹太主权。

这种历史性的关联正是巴勒斯坦发言人决定反驳和挑战的。为了强化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为耶路撒冷正宗本地人口的形象，前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添加了另一个歪曲事实的观点。在他的联合国演讲中，哈利迪将伊斯兰在耶路撒冷的主权追溯到了 638 年，当时第二任哈里发 Umar bin al-Khattab 走出阿拉伯半岛，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

但是阿拉法特把巴勒斯坦的历史主张与在建立古代以色列都城的大卫王之前统治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 (Yebusites) 关联在一起。阿拉法特表示，他的祖先是迦南王。此外，2000 年 7 月当他在戴维营与克林顿总统讨论耶路撒冷的未来时，他否决了所有古代犹太人与耶路撒冷的关联，甚至否认犹太寺的存在。²² 很可惜，在多次前往罗马会晤意大利政府的旅途中，阿拉法特从未在提图斯拱门前停留，否则他本来可以看到他宣称从未存在的圣殿的灯台和器皿。

最近几年，巴勒斯坦散布的犹太圣殿不存在的谣言愈演愈烈，甚至已被从埃雷卡特 (Saeb Erekat) 到沙阿斯 (Nabil Shaath) 等多位巴勒斯坦领导人信以为真。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 (Mahmoud Abbas) 也采纳了这种说法。当巴勒斯坦总理萨勒姆·法耶兹 (Salam Fayyad) 在 2008 年 11 月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演讲，并表达对耶路撒冷的评论时，他大谈特谈基督教和穆斯林与这座城市的渊源，却对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关系只字不提。

遗憾的是，西方观众往往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严重削弱以色列权利的虚假言论。例如，《时代》杂志在 2003 年 10 月将圣殿山描述为一个“犹太人相信所罗门和希律王建造了第一座和第二座圣殿 (强调)”的地方。圣殿的历史被抹杀，但依然是以色列叙事记录的一部分。它可能已经存在，或者并不存在。怀着这个疑问，学术界也开始呈现下滑趋势。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 Nadia Abu El Haj 的著作，其中把圣殿称为“国家历史传奇”。她随后在巴纳德学院任教。

篡改历史最让人感到讽刺的是，圣殿恰好是传统伊斯兰教历史的一部分。《古兰经》的伟大评注者都承认圣殿的存在，如：《哲拉莱尼古兰经注 (al-Jalalayn)》在第 17 章中试图解释著名的穆罕默德夜行之旅，“荣耀归于他，让他的仆从从神圣的清真寺夜行来到更远的清真寺。”

神圣的清真寺是指麦加，但“更远的清真寺”指的是？答案是更远的清真寺是“Beit al-Maqdis”，意为“圣殿”，读音就像希伯来语“Beit Hamikdash”。²³ 这最终成为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术语。巴勒斯坦通过“否认圣殿”而破坏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主权宣示，不仅无视考古学和历史学记录，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否定了自己的伊斯兰传统。

以色列舆论和耶路撒冷

尽管过去几年关于耶路撒冷的误解逐步扩散，人们对以色列的外交立场也产生了疑问，而且许多文章断言以色列已经达成共识，不再坚持维护一个不可分割的城市，但实际上，以色列公众从未对耶路撒冷失去信心。²⁴

削弱公众支持的努力未能得逞。根据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达哈夫研究小组在米娜(Mina Tzemach) 博士指导下进行并于 2011 年 6 月 6 日发布结果的民意调查，以色列公众依然支持维护耶路撒冷的统一。当被问及在和平协议框架内保持统一的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时，69% 的人回答“非常重要”，而 16% 表示“重要”。这意味着 85% 的以色列公众依然认为应该保留一个统一的耶路撒冷。

当被问及耶路撒冷的独特遗迹时，投票结果极具启发意义。针对和平进程中的不同让步，6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绝对不同意以色列把圣殿山交给巴勒斯坦，而仅仅保留西墙的解决方案。这是克林顿参数中关于老城区的设想之一。大约 13% 的人表示他们倾向于不同意这样的提议。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75% 的以色列受访者反对把放弃圣殿山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即使以色列可以继续保持西墙。

保护耶路撒冷圣地的的重要性

该数据表明，以色列人与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地血脉相连，并且明白一旦以色列放弃这里，必将陷入万劫不复。这些立场毫无疑问来自以色列自身的真实经历。毕竟，1948 年阿拉伯联军接管了犹太区，开始系统性破坏或亵渎了 55 座犹太教堂和学习大厅，如：伟大的波拉特·约瑟夫神学院。老城区的犹太人遭到了种族清洗。约哈维教堂(Yohanan Ben Zakai Synagogues) 就沦为了老城区阿拉伯居民的马厩。

同时，1948 年至 1967 年，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西墙地区以及他们自己的圣地。

在近代，人们同样明白，一旦巴勒斯坦控制了老城，这片宗教圣地同样难逃厄运。根据《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有责任保护其管辖下领土上的犹太圣地。2000 年 10 月 7 日，纳布卢斯的约瑟夫陵园遭受由巴勒斯坦平民和安全部队组成的巴

勒斯坦暴民的袭击。

希伯来文被摧毁，暴徒们甚至试图用铁棍和钢管拆除陵园内的石块。他们还破坏了墓穴的穹顶。

2011 年 4 月，以色列人收到了另一个如果巴勒斯坦人无法履行其在圣地责任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警示，当时巴勒斯坦安全人员杀害了一名和哈西德教派(Breslover Chasidim) 共同参拜约瑟夫陵园的青年人本·优素福·利夫纳特(Ben Yosef Livnat)。这些事件迫使以色列密切关注对圣地的保护。

基督教场所在巴勒斯坦统治下也屡遭袭击。2002 年 4 月 2 日，法塔赫-哈马斯组织了 13 名恐怖分子，进入了伯利恒圣诞教堂，劫持了神职人员，并将其扣押了 39 天。总体而言，过去十五年中，圣地失去了传统的防御能力，频繁遭受激进的伊斯兰团体的攻击。从阿富汗巴米扬山谷内具有 2000 年历史的佛像被塔利班摧毁开始，这种乱象愈演愈烈。此类行为最终获得了哈马斯的上层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的精神领袖优素福·卡拉达维(Yusuf Qaradawi) 的支持。在激进的伊斯兰教鼓动下，这些针对非穆斯林宗教场所的袭击从巴基斯坦蔓延到了伊拉克，最近还波及到了埃及。

国际化也不是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答案。

1947 年，联大第 181 号决议提出了国际化方案，但事实上行不通，并最终失败告终。

耶路撒冷遭受了三支阿拉伯军队的攻击。保护耶路撒冷 10 万犹太人免遭涂炭的唯一力量是以色列军队。联合国在 1948 年没有为耶路撒冷遭受的威胁提供丝毫援助。毫无根据地设想一个由存在利益冲突的成员组建的国际机构，和 1948 年的联大决议一样不具有任何可行性。

简言之，以色列自己的历史以及最近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耶路撒冷最利害攸关的目标。

如果以色列同意重新划分耶路撒冷，将失去对老城的控制，而圣地的安全无疑将遭受间巨大风险。以色列外交界必须明确一点，唯有自由而民主的以色列才能保护耶路撒冷的所有信仰。

保持耶路撒冷接纳所有信仰是以色列国的历史责任。然而，耶路撒冷一直处于以色列和更为广泛的犹太世界中内部大讨论的核心。许多具有更多特定倾向的人非常明白，1967 年重建以色列正是经过世纪流放，甚至在几十年前差点灭绝的以色列人复兴国家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里，犹太人首次恢复了 1863 年的多数化优势，而全世界也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权利与职责。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民族的古老历史及其现代复兴之间的交汇点。

其他更具普遍性的观点把耶路撒冷视为欧盟、俄罗斯、联合国和美国主持的和平进程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以此优先将现代以色列国家纳入国际社会。

实际上，20 世纪 90 年代精心策划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签署和平协议的盛大典礼旨在提醒以色列已经被国际社会认可，而且他们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已经正常化，并且和上述外交进程密切关联在一起。

以色列内部的特殊本能及其普遍性的希望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四十年来该国政治辩论的核心。然而，耶路撒冷是两个国家本能汇聚的地方，为了保护以色列主权下的耶路撒冷，以色列国承担了一个广泛的使命，让圣城始终保持真正的自由，接纳所有的信仰。

独特主义者必须明白，未来将有其他更多信仰进入圣城，而普遍主义者也必须承认，他们的内部遗产同样值得保护，一旦失去，就会遭受巨大的不确定风险。

结论

在国际联盟授权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之前，存在许多让犹太人民重返古代家园的提案。从 1799 年拿破仑·波拿巴的宣言到 1918 年西奥多·罗斯福的著作，犹太人民对其古代家园的历史权利与他们对耶路撒冷的主权密切相关。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哈伊姆·威茨曼 (Chaim Weizmann) 在英国上议院发言时，提到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对自己立场的大力支持：

在我看来，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本来就是建立在耶路撒冷之上的，如果犹太人在这座城市得不到任何的土地，是相当说不过去的。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怎么能不去同情犹太人呢？我们都还记得他们长久以来的坚持、哀婉与渴求：“啊，耶路撒冷，如果我的记忆里没有了你，那么也让我的右手忘却它所有的灵巧吧。”²⁵

因此，重返以色列之地 (Eretz Yisrael) 和收复耶路撒冷的统一理念逐步获得了西方的认可。

值得法学家在著作中重点描写的是犹太人民从未放弃这些权利，并通过祈祷、斋戒和朝圣而身体力行的事实。在现代以色列的外交领域，各种形式的困境接踵而来，尤其是在“六日战争”之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权利获得了一些最重要的国际法权威部门的支持。

在多年来的阿以和平进程中，提出了各种重新划分耶路撒冷的方案，但实际上没有达成且提交议会批准的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以色列舆论继续坚持犹太人保留在以色列主权下统一首都的权利。未来这些权利是否可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取决于以色列能否证明其可以独立确保圣城接纳所有信仰。这是一个以色列过去已经达到，并且毫无疑问未来将继续满足的标准。

注释：

* 本文是一份于 2011 年 6 月 6 日提交给英格堡雷纳耶路撒冷研究中心的文稿的扩充版。

¹ 马丁·吉尔伯特，“耶路撒冷：犹太权利的缩影，” *Israel at 60: 历史和法律权利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2009 年)，第 22 页。

² 威廉·福克斯韦尔·奥尔布赖特等人，*巴勒斯坦：犹太、阿拉伯和英国政策研究*，Esco 基金会 (新天堂：耶鲁大学出版社，1947 年)，第 1 卷，第 229 页。恩斯特·弗兰肯斯坦，*我的人民的司法正义：犹太人案例* (伦敦：尼尔森和沃森，1943 年)，第 88 页。实际上历史记录显示犹太人屡次抵抗重大的武装起义，115 年对抗图拉真，135 年对抗哈德良，351 年对抗卡鲁斯，614 年犹太人联合波斯人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参见 S. Safarai，“密西那和塔木德时代，” H.H. Ben-Sasson (编辑)，*犹太人民的历史* (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 年)，第 330-363 页。

³ J. 斯托亚夫斯基，*巴勒斯坦托管地：国际托管的理论及实践贡献* (伦敦：朗文格林公司)，第 65 页。

⁴ 同上，第 241 页。

⁵ 斯蒂芬·M·施维贝尔，“以何种分量来征服？”《美国国际法杂志》(1970 年)，第 344-347 页。

⁶ 约翰·诺顿·摩尔 (编撰)，*阿以冲突*，第四卷：对和平的艰难寻找 (1975-1988)，第一部分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815 页。

⁷ 阿瑟·哥德堡，致编辑信函，*纽约时报*，1980 年 3 月 6 日。

⁸ “1999 年 3 月 25 日联合国安理会巴解组织观察员提交的有关联合国大会第 181 号决议的信函，” 联合国文件 A/53/879，S/1999/334，1999 年 3 月 24 日。

⁹ 伊莱休·劳特派特，*耶路撒冷与圣地* (伦敦：盎格鲁-以色列协会，1968 年)。

¹⁰ “联合国大会第 181 号决议，1947 年 11 月 29 日，” 耶鲁法学院阿瓦隆项目，载于：
<http://www.yale.edu/lawweb/avalon/un/res181.htm>

¹¹ 拉里·柯乐特，“国际法中的耶路撒冷主权，” *哥伦比亚跨国法律期刊*，第 20 卷，1981 年，第 350 页。

12. 尤金·V·罗斯托，应对，美国国际法杂志，1990年7月。

13. 尤金·V·罗斯托，
“巴勒斯坦的未来，” McNair 论文 24（华盛顿：国防大学，1993年），第10页。

14. 伊尔·约书亚，“阿布·马赞：政治档案，” 特别报告，第15期，MEMRI - 中东媒体研究所，2003年4月29日，载于：
<http://www.memri.org/report/en/0/0/0/0/0/0/856.htm>.

15. “塔巴谈判的巴勒斯坦报告，” MEMRI 特刊，第184期，2001年2月7日，载于：
<http://www.memri.org/report/en/0/0/0/0/0/0/419.htm>.

16. 有报道称，外长什洛莫·本·阿米希望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对耶路撒冷做出让步。他在希伯来文回忆录中承认，美国驻联合国大师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警告他，联合国仅支持未来可以实现但不应强制解决的协议。参见，没有后卫的前锋：前往和平进程边界的航程（特拉维夫：新闻图书，2004年）[希伯来文]，第309页。

17. 新闻图书，2000年12月29日。

18. “会议纪要：埃雷卡特与大卫·黑尔，” 半岛电视台透视单元，载于：
<http://www.ajtransparency.com/files/4835.pdf>.

19. 参见瓦利德·哈利迪，“控制耶路撒冷”，载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x8BM0rylnM&feature=BFa&list=PL001B57CA656A0C49&index=1>.

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的法律案件的典型表现，参见亨利·卡坦，耶路撒冷（伦敦：萨奇图书，2000年）。

20. 实际的英国有线台，参见多尔·戈尔德，耶路撒冷之战：激进的伊斯兰、西方和圣城的未来（华盛顿：Regnery 出版社），第290-291页。

21. 马丁·吉尔伯特，“耶路撒冷：一座城市的传奇，” 新共和国出版社，1994年11月14日。

22. 同上，第11-13页。

23. 同上，第17页。

24. 詹姆斯·卡罗尔，“内塔尼亚胡的极端误区，” 波士顿环球报，2011年6月6日。

25. 关于拿破仑的把耶路撒冷还给犹太人民的宣言，参见奥尔布赖特等人的著作，第1卷，第2页。泰迪·罗斯福的关于围绕耶路撒冷启动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出现在迈克尔·B·奥伦的著作《实力、信仰和幻想：美国在中东，1776至今》（纽约：W. W. Norton，2007年），第359页。威茨曼总统在1948年12月1日的演讲中援引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话，载于：
<http://www.mfa.gov.il/MFA/Foreign+Relations/Israels+Foreign+Relations+since+1947/1947-1974/3+Israel+Claims+Jerusalem+Address+by+President+We.htm>

以色列和中国之间的比例

